
盐民儒士的价值取向与明清时期

淮南盐场灶户宗族的兴衰

——金沙场文锦堂《邱氏宗谱》释读

陆玉芹¹ 张艺²¹

(1. 盐城师范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2;

2.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234)

【摘要】：淮南金沙场《邱氏宗谱》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朝道光四年，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近500年的宗族历史。宗谱呈现了邱氏族人中儒士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淮南金沙场乡里社会实态，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身为移民编入灶籍的灶户家族中的精英们，为宗族建构不断奋斗、调适、挣扎直至衰落的历程。

【关键词】：明清时期 两淮盐业 儒士 金沙场 邱氏宗谱

【中图分类号】：G112;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8)05-0112-08

“自古煮盐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史学界对两淮盐业的研究更多侧重对盐政、盐商、盐法等领域的研究，而对区域内的灶户宗族与乡里社会的动态关系研究则较为薄弱；在史料运用方面更加倾向使用官方档案，对民间文献则不够重视。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推广和实践，越来越多的民间文献如家谱、碑刻、民间收藏被发现并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此为资料在盐业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越来越多^①，其中关于两淮地区民间文献的运用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黄国信、王振忠、徐靖捷、姚恩荣等学者为代表^②。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淮南金沙场的一套16卷本《邱氏宗谱》，其中详细记载了从元末明初至清朝道光四年，邱氏宗族从明初“入籍通灶”^{[1]19}到清末“灶籍裁乃入通民籍”^{[1]20}近5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对邱氏先祖事迹的追述以及对邱氏族人与金沙场乡里社会动态关系的描述。我们同时又发现，《邱氏宗谱》的编撰者和嘉庆年间官修方志《两淮金沙场志》是同一人——邱标（邱氏十二世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沙场邱氏宗族的文化建构^③。本文以《邱氏宗谱》为个案研究，进一步探究金沙场邱氏家宗族儒士的价值取向及邱氏家族的盛衰递嬗。

一、《邱氏宗谱》简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10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LSB001)

作者简介：陆玉芹，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张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明代史起螯的《两淮盐法志》记载：“两淮运司盐场东北临海，南界海门通州，西抵如皋、泰州、兴化、盐城，起吕四，据庙湾，绵亘八百六十有一里，是为淮南盐场。”^{[2]185}金沙场是淮盐盐场的重要盐场之一。《南通盐业志》记载：“金沙场又名古沙。唐代为煎盐亭场，隶属海陵监（治海陵，今泰州市）。南唐至北宋初年（937-960）建场。原名布洲场，后改金沙场。隶属通州丰利监（驻通州），为所属八场之一。明洪武初年（1368）隶属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通州分司（先驻州城，后驻石港场），为‘上十场之一。清代沿而未改。”^[2]由此可见，金沙场从唐末宋初开始建盐场，曾属海陵监、丰利监，明清两代属于通州分司，且为淮南盐场之南界。

在金沙场发现的《邱氏宗谱》为清道光四年（1824）木刻板，由十二世孙太学生邱标和十四世孙邱山主持编撰，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由族伯叔兄弟与同族诸君子跋涉舟车，不辞劳苦地考证“现在支派或移居他方，远谪异地”者，经历五个寒暑而于道光四年甲申荷月告成。

按照《邱氏宗谱》目录上的记载，该份宗谱应该有16卷，包括序言集、宗祠图、墓图、祭祀礼仪规范、世系、列传、族训、艺文集等等，可是目前找到的却只有6卷，世系8卷不存。

据《邱氏宗谱》卷1记载，邱氏始祖念八公与兄念七公本居苏州虎丘北流村口。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渡江而北。念七公一支迁居他邑，迄今已无从稽考。而念八公“迁居通之金沙场”，寄居崇川姜灶境内，“前明定鼎，隶籍通灶”^{[1]20}，“以煮盐为业，为盐官副使”^{[3]294}。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或流离失所，或服从官府命令集体迁徙。而据邱氏后人口述，邱家祖上居住在苏州虎丘一带，后才举家搬迁到位于今江苏中部的南通姜灶地区，以煮盐为业，后人的口述内容与文献资料基本吻合⁽²⁾。

二、邱氏宗族儒士的多元价值取向

所谓“儒士”，一般指服膺儒家学说的人，也可泛指读书人、知识分子、预备官员的主力军，是官僚机构所需要的官僚的主要来源”。邱氏族人从始祖念八公于明初“入籍通灶”开始，便世袭其灶户盐民的身份，虽说念八公为盐官副使，但灶籍之民毕竟地位低下，为获得社会地位的进阶，邱氏族人纷纷开始诵读儒家经典，力图跻身官僚统治阶层，提高他们的地方名望，获得国家对其儒士身份的认同。与此同时，明清政府也给了“蓬首墨肌，灰卧糠食”^{[4]135}拥有真才实学的“灶民之后”提供了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条件，于是邱氏族人中不少儒士通过自身努力，展示了不同价值取向。

1. 学而优则仕者——盐官

明清两朝注重科举取士，各阶层民众皆平等享有考试机会。据洪武初年《明太祖实录》载，“凡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吏胥、习举业者，皆许应试”，除“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以外，“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5]。作为盐民的后代，邱氏族人在明清重视科举又不问出身的有利条件下，读书成儒成为其改变自身地位的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据何炳棣先生《明代特殊身份出身进士表》统计，从明代1371年到1643年间，灶籍出身的进士有388名^{[6]33}，虽在民、军、匠、灶四大户等中，实属人数最少之列，但足以证明灶户之民中不乏读书之人。最有名的便是“国朝大学士高文义公谷，侍郎杨鸥溪果，近日逸士王心斋良”^[7]，这些同乡饱学之士进阶，对邱氏家族有着明显的示范作用。自始祖念八公后，邱氏族人“名登选举，身历仕途，高中南闱”者历代皆有。

邱氏二世祖惟岗公便是淮南盐民中“学而优则仕”的典范。《邱氏宗谱》卷13《惟岗公传》载：“公名宙，字惟岗，念八公之季子也，幼而聪颖，顿悟绝伦，读书每数十行下，经史百家若不足当……奇才迥出，倜傥不群，凡簿书累积，过目辄记诵，尤工筹数。是时，家业颇盛，念八公以老年，不能经理，因尽委之于公，公亦不敢劳厥兄，朝则治烦，夜则勤读，微文杂义，靡不贯通，后遂考取授十安大使，佐理饷务，出入咸宜，讷毫不爽，秉公持正，允称厥职。凡盐司大臣无不闻公之名，睹公之事而加奖赏之。”^[8]正是因为惟岗公从小就聪慧过人、过目不忘，这才使他在治理家产的同时能够留有空余时间勤读不辍，通晓儒家经典，并最终成功考取十安大使，上升为盐官这一阶层，并为乡里乡外所称道，为盐司大臣所奖赏。另有邱氏十世祖兰生公亦是如此：《邱氏宗谱》卷13《兰生

公传》载“兰生公，号香谷，兆华公次子，天资英敏，有异才，遇事处决如神泛应曲，当授盐运副使，宅第闲阔。凡运司运判巡视来场，俱适馆于其家，与公若旧相识。”^{[8]1}

在芸芸穷苦盐民中出现一两个稍有品阶的盐官，实属不易，也足以光宗耀祖，使得邱氏一族在乡里占有大族一席之地。可是在《邱氏宗谱》记载的邱氏族人中，除了一世祖念八公出任盐官副使，二世祖惟岗公邱宙考职“十安大使”，十世祖兰生公“授（明）盐运副使”之外，大多数邱氏儒士族人品阶都较低，多为九到七品的散官或是像庠生、太学生这样的生员。

2. 传道授业者——儒师

两淮盐区的盐民教育一向不发达，相比其他地区甚至比较滞后。虽说在明初便在两淮盐区设有社学，《明会典》载“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9]420}，但是由于没有设立盐政专学，导致两淮盐区还是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社学废弛、书院稀少的局面，两淮商灶子弟只能在附近州县学就读，又多有限制^{[6]11}。

于是，一批未入仕又不甘成为逸士的盐民儒士在盐场馆舍或是在自己家族中开始自觉地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淮南安丰场的王艮创办的东陶精舍为地方教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0]。邱氏族人中也有这样的儒士，《邱氏宗谱》卷13《世玉公》记载：“五世祖世玉公，讳珰者……公自幼习举子业，长入太学，例赠修职郎，以祖若父年俱高，未赴选。因辟家塾，教授子侄辈。”在其教授下，他的五个儿子长子邱情成为廪膳生、候选教谕，次子邱博为邑庠生，三子邱恂出仕杭城，四子邱愉为南村太学生，五子邱慄为迪功郎，另外他的两个侄子守贞公邱节中正德五年庚午科经魁，子安夫子中正德癸酉科举人^{[8]17}，可谓教之有方矣。

五世祖世玉公邱珰在明朝正德年间“私辟家塾，教授子侄”，其后人禄如公则是在清朝康熙年间被邀请至“馆舍”教授儒学。谱载：“邱公禄如，古沙望族，德优学富，志洁行方，有古君子之风。敝地有村名北团者，土沃人稠。国朝康熙三四十一年间，村人设馆舍，延公训诲。”^{[8]61}

在盐民教育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成为儒师的邱氏族人不论是其学问还是其名声威望都会在当时甚至后世遗泽后人，就像《邱氏宗谱》中所载：“迄今数百年，村中尚有文物声明者，类皆公之泽留貽也。”

3. 追先贤风骨者——逸士

在《邱氏宗谱》中，我们发现许多儒士并未做官，其原因不一，有的是屡次科考，却不能高中南闱；有的是考取功名，却屡次未能授予官职；有的则是对考取功名不屑一顾，在学习儒家经典通晓古今义理后，他们选择仿先贤而为之，做享山水之乐的逸士。

在《邱氏宗谱》卷13中共载有39位先祖的传记，其中明确指出未参加科考而隐于山水间的有4人，分别为惟道公、惟忠公、石公公、濞远公，其中惟道公“好读书，不与外事，逍遥田亩间，隐居自乐”；惟忠公“居恒简，默自处，不与人泛论，不与人概谈往事，其貌恂恂如若不知书，而日用寻常一言一动无不本于书，是以言无口过，行无怨恶，终身不失色于人，不失足于人也”；石公公“邑之高人也，清闲俊逸，雅秀天成，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性嗜茶，隐居古沙南郡，有别业数间，櫺（笔者注：为原文破损缺字，下同）洞达，奇花异卉，四季周备，室内琴鼎、图书而外，俱列茶具，壶盏瓶铛，大小数十，虽多瓦缶，而实胜金玉……龙团、雀舌诸品，无不罗列，客至，则随宜而品质，公固不喜与世交，而世亦莫有敢至公室，其得与者，不过邑之一二君子”；濞远公“身寄市之中，心超市之外，背山临水，茅屋数椽，疎篱曲径，种竹栽花，每至菊秋，邀朋满座，或吟诗酌酒，或啜茗清谈，一时文人韵士俱推公为隐逸者。”^{[8]3}

另有一人守贞公，为正德庚午（明武宗，1510）科经魁，却因“屡会礼闱，未获登第”而“逍遥林下”。谱载：“公名节，字守贞，国恩公之长子也，生而挺秀，仙骨珊珊，有凤惠英……年弱冠，即补弟子员，捷足南宫，遂中正德五年庚午科经魁，淮海以南士林胥为之振奋。当日子安夫子欲改习春秋，公曾有七言诗一律寄之，仅识其首二句云：顾磐何必改春秋，落拓葩经也中邱，此固公之自嘲，

然亦可见我公之深于诗也。后屡会礼闱，未获登第。因逍遥林下，与二三知己，诗酒唱酬，借橘叟之隐以自乐。闻公之晚年尝得一神马，逾时可行千里，往往追风逐电，乘至维扬，与竹过寿，举子对弈，不日而返。是言恐属荒谬，亦不足信，而公之善弈也则可知。”^{[8]33}

在后世邱氏族人的口述中，曾有一个传说，说的是邱家祖上有一个神奇的玩意儿叫做“壁飞”，邱家先祖住在苏州的时候，就曾用“壁飞”飞去长安买豆腐，早上出发，中午便可回来煮饭以增添菜色⁽¹⁾。对比《邱氏宗谱》对守贞公的记载，这“壁飞”可能就是守贞公晚年得到的“神马”。几百年过去了，先人的音容相貌虽无人记得，但有关他们的逸事却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作为曾经因中“经魁”而使淮南士林为之振奋的守贞公虽以隐逸的身份度过晚年，但其在宗族以及乡里的社会影响一直留存至今。

读书、养花、品茗、吟诗、酌酒、对弈，或在山水之间，或在闹市之外，以邱氏族人为代表的盐民儒士展现了另一种价值取向。

4. 经世致用者——儒商和儒医

金沙场《邱氏宗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位儒商，邱氏十世祖瑞生公“幼失怙，幸有伯父遇明公教训成人。虽务农为业，而文理靡不贯彻，配张氏生五男二女，户口日益，家计良深，用是置身商贾，善货殖。不数年，获丰财大利，完男女婚嫁之事，裕子孙衣食之原。良田由公之经营，立业不憚，勤劬以至此也，嗟嗟！非伯父无以启兹后人之贤，非公无以继伯父之美，虽属布衣，要非寻常得而比拟者。生顺治庚子年，享年六十有九。”^{[8]59}像这样出身盐民灶户之家，自幼以务农为业，同时通晓儒家义理，却迫于生计，“置身商贾”，由于“善货殖”，结果“获丰财大利”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人，在淮南盐场中有着其特殊的作用，他们在各场之间贩卖货物的同时以自己的言行传播着儒家的义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淮南盐场盐民教育的滞后。

在《邱氏宗谱》卷13所载39位先祖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存在，他便是西庵公，乃一名儒医。谱传：“西庵公，霞吾公之子，善岐黄，力行济世，家有田数十亩，作小园，种植本草药，山林原隰，百卉俱收，每当花节盛开，又时藉以娱目，有症需之则即取，六气之原，悉其致病之由，达其受病之处，合其当病之时，而后以一二味治之，无不神效立愈，是以获生全者，不计其数，时人皆谓公之良医云。”^{[8]59}明清时期金沙场邱氏一族几百年的历史中虽仅有西庵公一人记录在谱，但却可见邱氏族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能够根据自己特长，为族人和乡人服务，并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医生是一个专门职业，非三年五载可习得，在淮南盐民中出现儒医的几率更是少之又少，而金沙场邱氏一族百年的历史中也仅有西庵公一人，儒医的出现无疑对淮南盐场儒士群体的研究有着更加深远的价值。

三、科举及第、乡绅名望及宗族兴衰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说过：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统治力量，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而名望的来源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11]。

在淮南金沙场这一隅之地，以团、总、场为单位的灶户群体中，邱氏家族先是以一世祖盐场副使的身份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一般灶户盐民，取得了个人名望，后又以邱氏子弟屡登红榜的荣耀闻名乡里，使得邱氏子弟的个人名望累加聚集成家族的名望，从而使得这种靠出身门第便可以名耀四方的先天名望与“文锦堂邱氏”这个家族的名号紧紧捆绑在一起，俨然一方望族。

1. 崇尚儒学，跻身官僚，获得国家认同

文锦堂邱氏自元末明初从苏州虎丘一带迁至南通之古沙后，始为金沙场灶户籍。第一代始祖念八公便是盐场副使，紧接着第二代惟岗公便考职授十安大使，“佐理鹺务，出入咸宜，谏毫不爽，秉公持正，允称厥职”，他们尽职尽责，受到朝廷官员的奖

赏,“凡盐司大臣无不闻公之名,睹公之事而加奖赏之”。

根据《邱氏宗谱》卷2中记载的从一世到十五世共49位先祖的画像和简介所作的统计,可以看出邱氏族人重视儒学教育,鼓励族人参加科考,邱氏族人中有明副使2人,明处士2人,明十安大使1人,明经魁1人,明候选教谕1人,明清庠生14人,太学生3人,修职郎4人,儒林郎1人,武庠生6人,文林郎2人,岁贡1人,候选县丞1人,共有34人,占比69%。可以说金沙场文锦堂邱氏的确是明清淮南盐民中儒士之家的典型。

科举及第、步入仕途是每个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可是自隋唐科举开考以来,又有多少读书人能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又有多少人闭门读书,却落得无功无名、衣食无以自保之窘境。作为灶户之族,对于“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藜藿粗粝,不得一饱”^{[2]239}以及“衣不补”的穷苦劳累生活多有感触,金沙场盐户邱氏始祖念八公之长子惟道公就曾这样教诲其子侄:“务以耕读为业,学力有余者趣之学,才力不逮者归于农。”

2. 乐善好施,德行并重,赢得地方尊重

邱氏宗族之间互相帮助,对修缮桥梁、庙宇、义堂、义冢等公共事务诸事极为热心。关于此类记载《邱氏宗谱》中比比皆是,如邱氏族人锦文公“于宗族无措者给本,无依者收(笔者注:原文字迹不清),邻里乡尝备沾其泽”。象九公“刚方正直,好行其德……救急济难,遇婚媾丧葬,匮乏不给者,竭力周旋,不惜解囊以赠其闾,于伦常缘分尽礼更不待言,又尝见其除当道之荆棘,利往来之行人。一切桥梁道途,缺坏不完者,或佣工修补,或庀材建设,务使人无病涉而后安……”,因此“两淮奉职大夫深嘉其德,旌以一方”。这种家学教养,代代相传,“仲泽公讳日润,生五瑞公,五瑞公生傅严公,三世皆君子也”。仲泽公致力于抚恤孤儿,两淮奉直大夫萧公祖因此对仲泽公优礼倍至,使“育婴堂犹列公名焉”。仲泽公之子五瑞公“曾以本场运河南寿星堂祖中良田十亩施为义冢”;仲泽公之孙五瑞公之子则于乾隆十四年买下小河西数十顷田地和五间房屋作为“合族宗祠”,“至于邑中诸事,年荒有赈,俗敝有争,靡不扶危”,除了在乡里排忧解难,还以“其学力素震于士林”。

通览金沙场《邱氏宗谱》可以发现,其中不乏非邱氏族人着笔的相关祝寿诗歌,如村人袁壁煌曾题《贺起岚社兄六十自寿元韵》《贺邱母季儒人五十节寿》,嘉庆戊辰十三年六合县教谕赴凤阳县教授^[12]王云台题《贺邱吕泉先生六十寿》、康熙年间御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北京刑部云南清吏司郎中眷侍教生王徼通题《奉贺大慈即荣赠邱母王老孺人八秩大寿》等祝寿文章^[13],其中不乏进士及第后的官员为邱氏族人祝寿,可见邱氏家族在金沙场的名望之盛隆。

而这种乡绅的名望也的确给邱氏族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改变。文锦堂邱氏在金沙场乃至周边地区的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他们有机会参加名流聚会,例如参加以登高望远、饮酒赋诗为旨趣的“翠微诗社”,并成为诗社中的灵魂人物;他们可以汇集全族力量,耗时几十年来编纂体系繁杂、卷数繁多的文锦堂《邱氏宗谱》,以此来炫耀自己的门楣并流传后世;他们还可以主持编纂地方文献,因有功于地方文化发展传承而被功册记载,例如上文所提及的《两淮金沙场志》便是由邱氏族人邱标受旨领衔编纂。

3. 盐场变迁,族人颓废,宗族影响式微

由苏州虎丘移民,落脚金沙场成为受人鄙视的灶户(民),邱氏族人经过历代努力,成为盐官、逸士、儒商、儒师、儒医,这其中既有族人对学而优则仕的追崇,亦有退隐山林、经商致富、匡扶救世的自我调适和无奈选择。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邱氏家族逐渐走向衰落。

首先,金沙场盐业由盛转衰,甚至“不出盐”。明清时期,黄河屡屡夺淮,导致海岸线迅速东迁,两淮地区海边滩涂向东快速淤积增长,造成淮南古盐场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产盐量越来越低,金沙场产盐量也急剧下降,甚至产不出盐。正如《清史稿·食货志》载:“淮南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13],这使得邱氏家族发展失去了物质基础。

其次,自然灾害频繁,加剧了邱氏家族的衰败。据《两淮通州金沙场志》记载“金沙西去州泊四十五里,西北去石港三十里,东至余西二十里,南为沙土,北至范堤,或明取披沙拣金之义,古以金沙名之。相传古金沙在镇场及姜灶港,又谓观音山,以北曰唐灶港,故今张家港亦名唐灶港。又曰金沙,亦海门地。海门迁县,宅金沙一里,溢清六里,其遗迹可循也。金沙地分东中西三园。前明倭寇掠境灶民,聚处垸垵,相望为保障。虽僻壤荒泽,无高山大川,实为通郡之要津,海滨之门户也。昔近海,坍塌无常,今则南北沙渚涨息陆处已久……”^{[13]8}。近海坍塌,海水漫灌,潮灾频仍。在《邱氏宗谱》中有“乾隆三十年江潮内徙,江潮至坟前,是否迁坟”^{[8]74}、“乾隆三十三年江潮”、“乾隆五十三岁大水,浪急桥崩”、“金沙为江潮侵蚀,诗以悼之”等明确记载。

为了更好地应对盐场区位变迁和灾害带来的影响,发挥盐场灶户大族的优势力量,邱氏儒士们主动以儒家“仁义”“亲民”的名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出现了诸如“于宗族无措者给本,无依着收”^{[8]32}的国学生锦文公;“救急济难,遇婚媾丧葬匮乏不给者,竭力周旋,不惜解囊以赠其闾……是以两淮奉直大夫深嘉其德”^{[8]36}的象九公;“乾隆三十年间江潮内徙,朝夕审视,遍告同族……斋戒拜祝甚至号泣,日夜宿于墓上”^{[8]75}的五宗公等为乡里百姓排忧解难的儒士代表。

在海岸线东移和水旱灾害频发的背景之下,以金沙场邱氏族人代表的灶户宗族为挽救日益衰败的盐场及他们宗族大势的影响力,积极践行儒家救民之说,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其衰落的进程。

最后,邱氏家族内部自我更新能力日渐减弱。明初,邱氏家族的兴起由一世祖念八公奠基,由二世祖惟岗公加固,在接下来的几代中邱氏族人中都有“名登选举,身历仕途,高捷南闾”之人,因此文锦堂邱氏的名望越发影响深远。可到了近世,时代在发生变化,盐民的地位在变,淮南金沙场的重要性在变,而邱氏族人自身却停滞不前,乃至几代人间也未有科举及第之人。徜徉山水之间,诗词吟唱,虽能获得社会名望,但坐吃山空,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少,财富的消耗越来越多,不少儒士生活日渐窘迫,谱载“少时暴弃自蹉跎,日已西沉奈老何”,充满了自责和无奈;“冷坐荒斋缺脯脩,风风雨雨使人愁,伤心陌路谁青眼,多病中年早白头”,暴露了窘迫和衰败之状。

邱氏家族的自我更新能力减弱,除了主观进取意识减弱外,与政府对两淮盐场的财政依赖和干预抑制也有很大关联。虽然海势东迁和自然灾害引发的环境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对淮南盐场衰败产生一定影响,在“天下之利多取于淮”的影响下,官府对两淮盐场尤其是较为发达的淮南盐场日益产生了巨大的财政依赖。在淮南盐场产盐量日益锐减低迷的情况下,虽然屡次通过改革企图扭转其衰败形势,但政府长期的依赖和干预一直抑制着地方社会力量的主动性,重盐轻垦,扭曲了系统自身的演替,激化了人地矛盾,从而加快了官府垄断管制的自身崩溃^[14]。随着政府管控的崩溃,淮南盐场的优势地位也最终一去不复返,灶户纷纷被裁撤灶籍。《邱氏宗谱》载:“盛朝灶籍裁乃入通民籍”^{[1]20}后,当年的“家业颇盛”的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宗谱中记载有邱氏族人在60岁时附诗自述“五旬昔已感蜉蝣,瞬息光阴又十秋,连丧双亲多抱憾,曾生三子不分忧,硯田无税思维翰,书架常充羨邻侯,恨我才疏兼落拓,争如江上一沙鸥。”但是邱氏宗族毕竟不是一般灶户小民,虽不复往昔繁盛之景,但“薄粥三餐甘淡泊,此生端不受人怜”^{[15]45}的儒士风骨依然可见。

邱氏宗族始祖从苏州虎丘迁往通州金沙。为改变灶籍的低微地位,邱氏族人中的儒士一方面经由科举考试步入宦途,一度跻身盐官,经管盐务;在获得官方认同的同时,也为宗族的发展获取最大的利益。邱氏家族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盐场地方治理,通过捐输、报销、赈灾、周济邻里、悬壶济世、接待地方官员等方式,从而获得乡里社会的尊重;《邱氏族谱》和《金沙场志》由邱家后人——邱标编撰,更是强化了邱氏宗族的文化建构,“在宗族内部主导宗谱的编撰,在社会上尽力影响官方正史、方志、政书的编撰,就是明清时期宗族这种文化建构的必经之路”^[16],文锦堂邱氏终于成为金沙场的一门望族。然而,时移世易,随着盐场自身的变迁,随着盐场政策的变化,邱氏宗族儒士不可避免也出现了分化;金沙场优势地位逐渐丧失,最终出现“灶籍裁乃入通民籍”,改盐田为垦田,宗族中部分儒士出现了“终日无田种”的没落情形。而在此没落情形之中,邱氏族人中部分儒士为保持自己以往地方大族的优越地位以及自身崇儒的家学传统,以儒士的身份不断进行调适、挣扎直至没落。

参考文献:

-
- [1]邱标,邱山.邱氏宗谱:卷1[Z].刻本.通州:邱氏宗族,道光四年(1824).
- [2]史起蛰.两淮盐法志:卷3[Z].济南:齐鲁书社,1996.
- [3]季智.江海福地沙为金(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294.
- [4]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5]明太祖实录[Z].台北:台湾研究院史语所,1962:1258.
- [6]秦偲嘉.明代两淮灶户社会生活[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7]盛仪.(嘉靖)惟扬志[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29.
- [8]邱标,邱山.邱氏宗谱:卷13[Z].刻本.通州:邱氏宗族,道光四年(1824).
- [9]申时行.明会典[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吕小琴.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建构过程略探[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63-65.
- [1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2.
- [12]邱标.两淮通州金沙场志[Z].通州:南通县金沙文史修志办公室藏.
- [13]凌申.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1):11-17.
- [14]鲍俊林.明清江苏沿海盐作地理与人地关系变迁[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 [15]邱标,邱山.邱氏宗谱:卷16[Z].通州:邱氏宗族,道光四年(1824).
- [16]卜永坚.清初歙县槐塘程氏的文化建构[J].史林,2004(5):51-62,123.

注释:

1 如段雪玉以《庐江郡何氏家记》为线索再现了元末明初广东豪绅势力的兴衰,又以《香山翠微韦氏族谱》所载的《十排考》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明清香山盐场的社会变迁和食盐专卖制度下盐业生产和区域社会的互动(段雪玉《乡豪、盐官与地方政治:〈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见元末明初的广东社会》载《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4期);李晓龙则以《凤冈陈氏族谱》为基础通过对广东靖康盐场凤冈陈氏家族的个案研究展现了盐场灶户群体为争取家族利益最大化而与国家博弈的动态场景(李晓龙《灶户家族与明清盐场的运作——广东靖康盐场凤冈陈氏的个案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则对比1694年刊行的《两淮盐法志》和1673年刊行的《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来展现明清徽州商人的文化建构(卜永坚《清初歙县槐塘程氏的文化建构》载《史林》2004年第5期)。

2 参见黄国信《民间文献与盐场历史研究》载《盐业史研究》2013年第4期;王振忠《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

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徐靖捷《苏北平原的捍海堰与淮南盐场的历史地理考》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 杜正贞教授以王艮家族的宗族建设为例,认为两淮盐场灶户的宗族建设是失败的,没有像华南和华北那样将“宗族发扬光大,他们的努力只是自身士绅的征途中地方教化理想的实践”,没有转化成以宗法权威为中心的宗族。见杜正贞《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教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而吕小琴的观点则相反,她认为安丰场王艮家族的建构经历了立宗会、修族谱与建宗祠三个阶段,见《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建构过程略探》载《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4 口述史料。口述人:邱承云、邱承品,采访地:通州,采访人:张艺,采访时间:2016年7月12日。

5 口述史料。口述人:邱承云、邱承品,采访地:通州,采访人:张艺,采访时间:2016年7月12日。